

苦寒砺练,再绽梅芳 ——评新版《明实录研究》

王雪华,颜先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雪华(196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颜先辉(1981-)男,山东滨州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3-0429-0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优秀的作品无不是在刻苦磨练的基础上产生的,谢贵安教授《明实录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千锤百炼的学术精品。

《明实录研究》最初由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全书约 29 万字,这已是当时研究《明实录》最为权威和系统的专著。然而,作者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发掘新的资料,进一步对明代列朝实录进行研究,最终于 2003 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从初研到再版,共历 15 年之久的砥砺。新版《明实录研究》全书 39 万字,在《明实录》的研究领域,无论在篇幅还是深度都是空前的。本书共分九章,分别论述了《明实录》的国史地位、学术渊源、修纂机构、修纂过程、修纂人员、修纂程序、体例风格、版本收藏、价值缺陷等问题,对《明实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究。通读全书,不禁为著者的博学和精湛的学术见解所折服。将新旧两个版本对照细读后,发现新版在保持原书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在体系和内容上均作了一些重大的修正,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体例的结构性调整。其一,将原版第一章“《明实录》修纂的历史背景”的部分内容融入新版的一、二章中,并作了许多补充。新版第一章“《明实录》的国史地位”,从明代国史概念、政治斗争以及史学生态等角度,论述了《明实录》的国史地位及其确立的事实,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这样便将《明实录》放在广阔的政治和史学生态的背景下讨论,使我们对它有更为直观和全面的了解。较之旧版泛泛地描述《明实录》修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要深入而切实得多。其二,新版增列“《明实录》的学术渊源”作为第二章,探讨《实录》的学术源流,分别从起居注、时政纪、日历、原始档案等方面来阐述《实录》的史料来源和体例流变。由此,读者可以对《实录》的源头一目了然。其三,新版增添了第三章“明代史馆——《明实录》的修纂机构”。作为《明实录》的编写机构,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和分工运作等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明实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明代史馆,目前未见有系统的论述,故本章在这一方面具有开拓性。在史馆与翰林院的关系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并无决策权。关于史馆的设置地点及内部构成,均有详而有据的论述。明代史馆的管理制度之好坏事关《明实录》的修纂进度及质量,因此新版在第二节中,分别从人事、纂修、供给、门禁、考勤和奖励方面,对史馆管理制度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充分肯定它们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分析全面而透彻。以上是从制度层面来论述史馆的,那么作为史馆主体的修纂者是如何工作的呢?第三节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从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稽考参对官、催纂官等不同职位的人所承担的不同职责及其分工协作上,一一作了介绍和分析,使我们对《实录》的产生过程能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其四,将原版的第七章“缺陷与失误”和第八章“成就与价值”合并为新版的第九章,即“得失之间——《明实录》的价值与缺陷”,避免了以前简单的两分法,而是通过“得”与“失”的对比和权衡,使读者对《明实录》有更为全面、准确的了解。

第二,史料的大规模扩充。新版《明实录研究》比原版多出 10 万余字,究其原因,便是新版更为充分地占有了史料。

原版所列参考文献为 45 种,而新版则为 124 种,其中史料及著作 93 种,论文 31 种。若将《明实录》按其实际状况分成 13 种的话,那么本书的参考文献则达到 134 种。书中不仅应用了大量的历代《实录》原始资料,还应用了明清学者的史著,如谈迁的《国榷》、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王世贞的《史乘考误》等等,同时也征引了现代人的各种著作。史料的扩充强有力地支持了本书在非常细微的地方所进行的周密考证。在修纂人员一章中,作者搜微求遗,大量使用各种史料,不厌琐碎的对历朝《实录》的修纂者做了非常细致的考订,把《实录》所附“进实录表”与《明史》、《罪惟录》、《万历野获编》、《殿阁词林记》等史书或史料笔记相互参照,以纠正讹误,最终考订出具体的名单。原版中,修纂人员一览表只列举了姓名、官职,而新版则增列了“史料来源”一项。如《孝宗实录》的修纂人员一览表“史料来源”中,既有直接史料《孝宗实录》修纂官名单、《武宗实录》升赏榜文、李东阳《进实录表》,又有间接史料《殿阁词林记》和《世宗实录》等。上述细致甚至繁琐的考证,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功底,又表现出作者充分挖掘史料的治学态度。由于史料的补充和完善,使作者的许多具体结论和观点有的放矢,真正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使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可观性。例如在第一章论述《明实录》的崇高地位时,引用了朱棣在为《太祖皇帝实录》写的《序》中的话,“至若《实录》一书,则万世是非之衡,亦一时劝惩所恃也”,从而得出实录具有国史地位的结论,信而有征。有关明代起居注在万历朝复设问题,新版通过新发掘的史料,如《神宗实录》卷三九〇所载“(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丁丑)又以谕太子敕,或于某日某宫面见面谕,请皇上特命左右记其详,悉发示阁中,得疏传外廷,以昭天下,付之史馆,以垂万世。报可”等,从而有力地补证了万历末年起居注依然存在,否定了“万历朝复设的起居注为时‘甚暂’”的观点。

第三,理论的合理应用和观点的不断创新。新版还有一个突出的改进,便是将新的史学理论贯穿到著作之中。如第一章从史学生态的角度探讨了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从明前中期实录的“秘之金匱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致使野史泛滥,史学生态严重失衡,到后期《明实录》外传对野史的抑制过程,分析了《明实录》在明代史学生态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再如第九章应用陈垣史源学理论论述《实录》史料的溯源性。这些均是旧版所未有,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前沿成果。理论的应用,给人颇多有益的启迪。同时,新版较旧版在观点上还有不少的创新之处。如针对前人以为野史流行是由于国史失实(如沈德符所云“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的观点,作者则通过顾炎武“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野史)”的话,以及史学生态的考察和分析,指出:“明代社会上野史流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实录》修成后被秘藏禁中,使明代史坛出现国史的真真空状态。如果说野史是补国史之失实而兴起的话,那么它应该用真实来弥补不实,但实际上野史比起实录的失实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野史的泛滥,主要是因为社会上不见《实录》造成的。”这诚为创新之论。由于重新进行了结构调整,因此新版在第九章论述《明实录》的价值与缺陷时,能从正、反两方面详细考证实录的得与失,从而断言:“《明实录》中据实直书的地方占了绝大部分,绝不能因为它存在的曲笔诬饰现象而否定其价值”,最终得出“它是无可取代的”结论,这较旧版而言是一个进步。新版的观点创新,还建立在作者着眼于宏观背景的把握上。由于《明实录》是由当时人所修的当代史,史书的修纂不可避免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作者在第一章中,将《明实录》的修纂与权利斗争相交织的社会背景作了考察,认为明朝实录在三个方面卷入了政治斗争,即“君主利用《明实录》贬斥前任、树立己威”(如宪宗、世宗之类)、“史臣利用《明实录》攻击政敌,党同伐异”(如刘吉、焦芳之流),同时“党派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决斗”(如《光宗实录》的修纂)。《实录》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得到了深入的梳理。此论即为旧版所无。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书中尚有少量笔误,如将崇祯皇帝“其兄”熹宗误书为“其父”。二是某些论断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作者认为,自晋迄清只有明代未修纪传体国史,而以实录充为国史,究其原因在于皇权的强化。这个观点就值得重新讨论,一个反例是,清朝皇权的强大丝毫不亚于明朝,却特开国史馆以修纂纪传体国史。

通观全书,缺点与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者不仅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明实录》提供了一种模式或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种踏实的治学态度。在人心浮躁的今天,一些人一味追求学术数量,按他们的做法,本书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增加一些内容,即可成为另一部著作,取名为《明实录与明代史学》,而本书作者则仍然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不过,从国际学术界重视再版书的惯例来看,作者虽然没有增加学术数量,但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学术质量。

(责任编辑 桂 莉)